副县长救助受伤女孩为何引关注

王钟的

在这个路上出现有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围观者碰都不敢碰一下的时代，宋副县长这种“豁出去”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热心救助受伤女孩，山西忻州定襄县副县长宋海平近日受到关注。当时，他路过一车祸现场，让周围的人帮忙，将受伤的女孩轻轻放在车上，又让司机赶快送往医院。在救人过程中，他还拿出手机打通县医院的电话，让医院的医护人员做好抢救准备，送人的车马上就到。宋海平认为救人只是举手之劳：“每个普通人看到都会这么做的，我感觉没什么。”（澎湃新闻网3月20日）

尽管强调救人是普通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副县长救人的新闻，不光在当地广泛传播，还上了网站的点击量排行榜。在道德困境日益成为社会讨论话题，老人和小孩倒在地上该不该扶成为现实疑问的今天，该案例无疑具有深入分析的意义。

敢于担当是网友给宋副县长点赞的重要原因。在现场人士都选择等待急救车到来，由专业人员开展营救的时候，宋副县长判断女孩生命体征平稳，决定抢时间送女孩上医院，承担了一定风险。在遭遇他人质疑的时候，他果断亮明身份，说“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抢救小孩要紧”，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在这个路上出现有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围观者碰都不敢碰一下的时代，宋副县长这种“豁出去”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具有副县长的职务，在救人过程中，宋海平调动了一般人难以调动的资源，这恐怕是该事件引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送女孩去医院的路上，他给医院打电话，孩子送到医院，医生护士就在门口等着，一分钟也没耽搁，马上抢救。后来，他还打电话询问医院孩子的治疗情况。伤者得到及时治疗，离不开宋副县长凭借自己的身份所做的各种努力。

副县长救助受伤女孩，被路人拍下后传到网上，一时成为佳话。这固然是一则具有正能量的暖新闻。不过，用逆向思维想一下，如果一位县领导经过车祸现场，选择袖手旁观，甚至扬长而去，被网友认出并拍下之后，传到网上恐怕同样会引起关注。人们对政府官员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位副县长看到了车祸不采取行动救人，就会被指责为冷酷无情、没有人性，甚至仕途不保。

在许多老人（孩子）摔倒，路人围观却无人搭救的新闻中，因为围观者都是普通人，社会就少了深入追究的理由和动力。没有一个普通人因为袖手旁观而受到实质意义的谴责。宋副县长所说的‘普通人看到都会这么做’，在现实中仍然停留于道德倡导层面。在更多的现实情况中，社会的道德情况不是那么理想，当然也没有特别糟糕——一般认为围观者打120急救电话，就尽到了救助义务，至于自己找车送孩子上医院，则是许多人不敢也不愿做的。

我们要给宋海平副县长点赞，是因为他尽了一位官员应尽的义务，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然而，像宋副县长那样官员救人的事迹被大量、自发地传播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道德困境。在更多的时候，遭遇车祸的女孩、不慎跌倒的老人，碰不上刚好路过的副县长，不会碰上具有特殊身份、有能力调动特殊资源的救助者。从这个层面看，宋副县长救人终究不同于普通人，普通人的救助能力和意愿还需要更大提升。

“25岁中年危机”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个拥抱

陶 舜

“25岁中年危机”就是社交网络时代的青春伤痕文学——它由网民共同创作、集体传播、自我赏鉴，在自己的群体里面形成了一个闭环。展示伤痕就是渴望安慰，正如在朋友圈晾晒受伤，是为了得到一个拥抱——哪怕是虚拟的表情包。

近期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80后90后纷纷自嘲为中老年人，以至于“25岁中年危机”竟然成为一个热词。

这个热词的走红，是一次成功的网络行为艺术。最初它是打着权威消息来源的名号出现的。《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文章被巧妙地修改了标题，社交网络上的文章据此进一步发挥称，根据幸福感，青年被重新定义在“15岁到24岁”。其实，相关报道的原话是这样的：“澳大利亚人的幸福程度或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变化呈一条U型曲线，高峰处于15岁至24岁之间和75岁以后这两个年龄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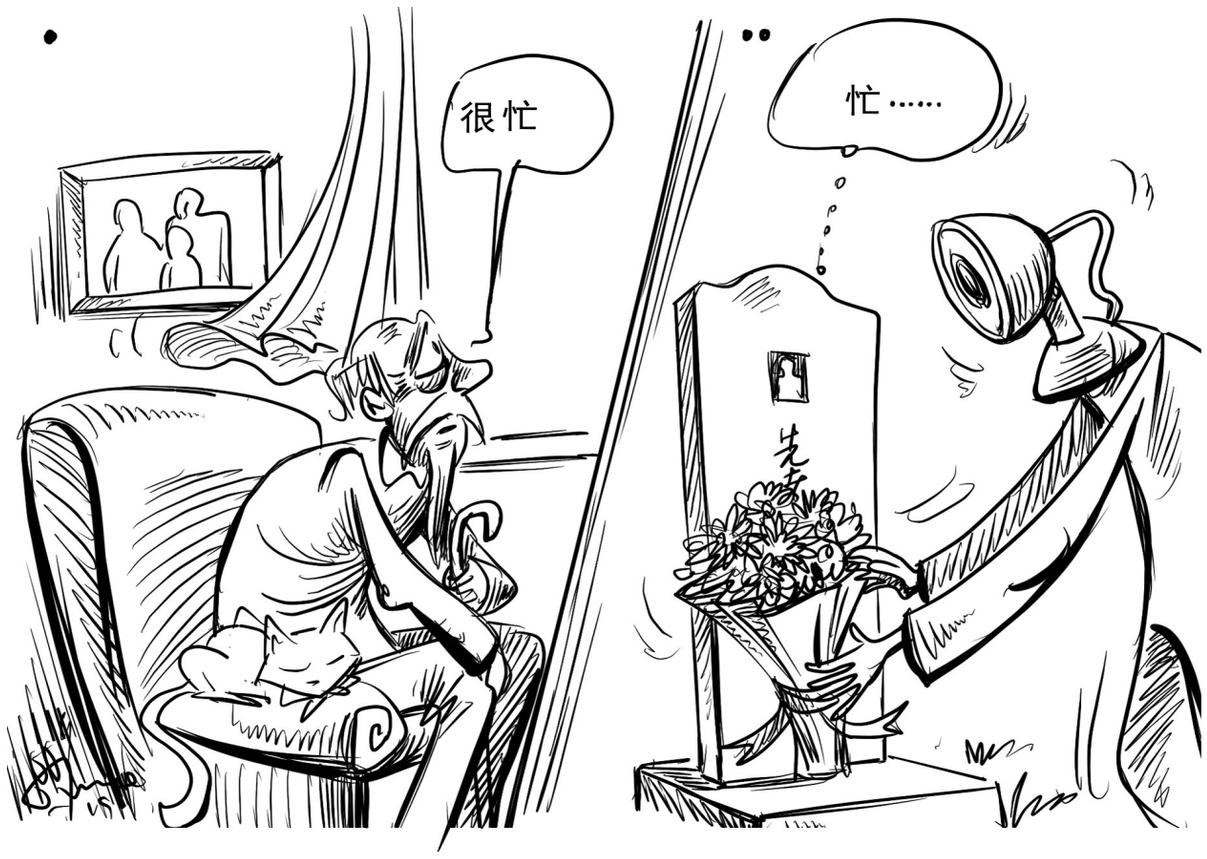
假设上述关于幸福感的描述属实，并且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那么25岁到74岁之间就是幸福感相对低谷的时期，称它为“中年危机”，从情感上似乎也说得通，并且具备触发网络流行的条件。观点够粗暴，逻辑冲突性强，你肯定不信，却又很愿意假装相信并进一步通过在网络上调侃和分享它。

24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于“变老”的浅浅焦虑是有的——只不过跟真正的中年人害怕变老不一样，他们的焦虑集中体现为“不想长大”，所以“25岁中年危机”有“真”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句明显导谬的结论反而得到了无厘头式的追捧。

25岁能算中年吗？惯常语境下，谁都不可能说那是中年。从中国通常的受教育年龄看，22岁本科毕业、25岁硕士毕业，仍是主流。但的确，漫长的教育经历消耗掉了一个人最富有青春激情的时光，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方面年华逝去，都想惜取少年时，另一方面又尚未经历社会生活，很容易为赋新词强说愁，从这个意义上讲，“25岁中年危机”就是社交网络时代的青春伤痕文学——它由网民共同创作、集体传播、自我赏鉴，在自己的群体里面形成了一个闭环。

展示伤痕就是渴望安慰，正如在朋友圈晾晒受伤，是为了得到一个拥抱——哪怕是虚拟的表情包。对“25岁中年危机”的自嘲与调侃，掩饰不了一代青年柔弱的内心，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尽管还没有正式步入社会历史舞台，但跃跃欲试的心态已经显露，然而面对时光，他们有着和前几代一样的焦虑，甚至更为焦虑。“25岁中年人”是不想长大的，矛盾的是，当他说出“不想长大”的时候，亦同时瞥见了青春的背影。“25岁中年危机”的自嘲，是希望透过假装地确认慢慢“自我确认”，中年尚未到来，但早晚是要来的，请给我安慰。

卖萌有两种，一种是正向的卖萌，所以在网络上，婴幼儿表情包和幼稚化倾向都很受欢迎，还有一种是反向的卖萌，把某种趋势极端化给人看，希望有人出手来阻止这种趋势，进而得到心灵的安慰。“25岁中年危机”属于反向的卖萌，它和“空巢青年”一道，精妙地刻画了一代青年的生存状态。



很 忙 南京最大的公墓雨花台功德园推出“代客扫墓”服务，并在线直播全程。逝者亲属向公墓方提出申请后，雨花台功德园将开设一间视频直播间，亲属通过公墓官方微信公号，在输入密码后即可观看“代扫”全程。（《新京报》3月21日）

漫画：徐 简

保护网络个人隐私有赖于法律防线

杨鑫宇

如何有效约束那些汇集了大量个人隐私的互联网运营商及其利益相关方，使其恪守为用户保密的责任，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问题。

房产中介为什么知道我有房要卖？保险公司怎么知道我最近买了新车？电信诈骗犯为什么知道我近期有快递上门？广告投放者又为什么知道我姓甚名谁？每当遭遇各种形式的骚扰电话，我们心中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竟然能把隐私摸得一清二楚，这实在吓人，而那些因此落入诈骗陷阱的人，对此更是有苦难言。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愈演愈烈，仅在最近，就有数起涉及上亿条个人信息的泄露案件被破获，作案人员达上百人。说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个人隐私泄露的威胁，恐怕并不夸张。

为打击猖獗泛滥的信息泄露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扩大了犯罪主体和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范围。一年多过去了，这一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争议，由于定罪条件模糊，量刑标准不明确，许多案件都无法妥善解决。

为解决这个问题，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说明最高法和最高检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认识到了法律作为个人隐私坚实防线的重要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各级司法机关都能从今天起立即严厉打击信息泄露犯罪，社会大众重新获得对于个人隐私的安全感，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自由谈

容得下‘阿大’们的城市才有人情味

曹东勃

如果一定要将这样的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就业正规化、常规化，这种过度精细、过度治理的结果，很可能在自寻烦恼的同时自缚手脚。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谈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提出，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和文化，源于美国、德国特别是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实践。它是社会分工细化、市场分工深化之后，在管理和服务层面提出的更加科学、精准、富有效率的要求。

城市管理精细化的最初目标，只是借助于信息化手段，建立一种对辖区管理空间分层分级全时段全覆盖的监督管理体系和可追溯、可落实到人的问责体系。这种基于应急预警和监督检查的处置机制，大体近乎于黄仁宇先生在论及古代政府治理机制时多次谈到的“数目字管理”。在数字化、大数据时代，这种“数目字管理”的治理目标，似乎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比如，一些企业已经可以利用开发的App对城市人流、车流密度进行实时监测，甚至基于此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各种预报。这还是在外围，真正“大而全”的数据，多半还零散地沉睡着。一个房管部门的基层官员曾对我说，每年本市电梯报修故障的分类别、分品牌数量，他们全都掌握。这种数据虽然是“一地鸡毛”，其对于商业和民生上的巨大影响和便利却难以想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精细化管理，首先指向了科学化、网格化。将地理学中的网格（grid）概念引入城市管理，提供了一种高度精密的经纬坐标，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延伸意向，即对社会网格、综合治理网格嵌入城市空间网格，使网格同时具有了空间、社会和治理三重属性。于是，一种旨在超然监督的体制机制，被整体转变和扩展为一种精细管理的平台和手段，这个过程颇似古代社会的巡察体制，总不免演变和固化为一种新的行政体制。

现代城市这个复杂的巨系统中的个体化对象，将越来越多地面对这种系统的整体有序性与个体自由度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系统有囊括和吞噬社会与生活的野心，系统中的符号也由一种虚拟的存在而翻转为实体。在当下人口大规模聚集、大规模流动的城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的交往规则与熟人社会迥然不同。后者主要靠“刷脸”，前者则必须“刷卡”。从社保卡、医保卡、信用卡、出入证到最重要的身份证，一切照章办事，只认证件不认人。这终于使得“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甚至‘如何证明你是你’成了难题，个体的存在需要系统的颁证和确认，否则几近寸步难行。局部均衡的格局再难守住，全域治理的逻辑势必展开。这种被规制了的、系统化了的现代城市生活，从应然角度说，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从实然角度看，也存在着内生的风险。

我们当然要充分肯定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这是城市管理水平适应快速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不过也得承认，精细化管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过犹不及。2016年声名鹊起的上海“阿大葱油饼”，因无证无照经营被执法部门要求关门停业，数月后迁址，证照齐全后重新开张。“阿大葱油饼”的死而复生，经历了一个极富戏剧化的反转过程。但城市管理者应当从这个貌似皆大欢喜的结局跳出，去反思精细化管理背后的深层问题。

将实存于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纳入传统上“证照齐全”的现代管理体系，固然彰显了城市管理者的雄心壮志，但往往难逃“一管就死”的困局。相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两极，社会的再平衡力量常常为我们所忽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阿大的葱油饼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弄堂存在了几十年，本身就是他所在社区那些经常惠顾的老邻居、老客户们的一种“检验”结果。如果他们经常因为吃葱油饼而坏了肚子，想必阿大的店铺不会安然存活几十年。这是一种社会的自发秩序。

每个大型城市都有着汪洋大海一般的非正规经济，每个城市中的阿大们也都有着他们深植于特定共同体而写就的传奇故事。如果一定要将这样的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就业正规化、常规化，这种过度精细、过度治理，很可能在自寻烦恼的同时自缚手脚。这种情况下，抓大放小不失为一种适宜的态度。

城市生活应当给人一种自由与希望，而不是失落和无助。当一个城市能容得下越来越多的阿大们，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和包容性，进而无需终日思索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深永动力，也不必时刻惦记“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难解之谜。

精细需要讲成本，治理需要讲效率。当我们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地去追求把所有层面管起来的时候，城市的活力也可能受到一定的损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我们强调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时，不能忘记‘以人为核心’这个城市化的初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的精细化管理，才能在城市整体卓越的基础上，绣好每一朵花，绘就美好画卷。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莫让基因测序沦为‘算命神器’

罗志华

得出一个科学结论必须经过严谨论证，不能存在含糊空间。通过基因测序来预测孩子的未来，缺乏严谨的论证，无非是一种想当然。

抽一滴血就能知晓孩子是否“天赋异禀”，取一滴唾液就能预测你的未来……近年来，基因检测市场日益火爆，各种基因测序项目层出不穷。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看似‘无所不能’的基因测序项目，实际上不少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高科技陷阱’。（《信息时报》3月21日）

基因测序在医学领域很有发展前途，比如通过测序和分析，可以研究某种疾病与特定基因形态的对应关系，进而早期发现并干预这种疾病。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之所以在未发病时切除乳腺，是因为她存在家族性缺陷基因。假如不事先切除乳腺，她将来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很高。许多类型的癌症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都能找到与特定基因的对应关系。

即使某些与基因相关的疾病已经出现，基因测序也可以帮助找到突变的基因，进而准确地进行靶向治疗，这正是精准医疗的研究方向。当人类化解伦理难题后，还可以在生命诞生前进行基因诊断及修复，大幅减少一些遗传病或慢性病的发病率。基因测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要保持正确的研发方向，它终将发挥出巨大潜力。

然而，基因测序技术也可能被滥用。当前被广泛运用的商业性基因测序，就是这类技术被滥用最突出的表现。这些项目虽然打个高科技的幌子，实际上是玩着伪科技的把戏。得出一个科学结论必须经过严谨论证，不能存在含糊空间。通过基因测序来预测孩子的未来，缺乏严谨的论证，无非是一种想当然。

窥探孩子的天赋异禀，甚至预测婚姻，检测进取心、节俭程度、性格和生活习惯等，这是算命先生才干的事，与科技‘八竿子打不着’。然而，借基因测序推广这些项目，不仅极具欺骗性，而且并不缺乏市场需求。这是因为，普遍民众不大愿意去探究深奥的科学理论，将基因测序通俗化，甚至通过想象去增补认知上的不足，易被民众认同和接受。

基因测序成为‘算命神器’，不仅坑害了民众，而且影响这一科技项目的声誉。将来有一天，当基因测序正式被广泛运用于诊疗后，或许反而得不到患者的理解与支持。基因测序尚处初始阶段，在此期间若不矫正一些不良倾向，将来或将付出更大代价。规范基因测序，抬高准入门槛，叫停无序开发和技术滥用，已成这一领域的当务之急。

有人在飞机上频频违规网民不弹反赞

朱达志

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弱，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他们对航空安全的漠视，还每每表现在对随之而来的规制行为的抵触，压根不管那样的抵触是否会造成飞行安全之虞和航班延误，以及其他乘客之权益受损。

航空安全无小事。但一些国人的航空安全意识并不高，屡屡发生一些漠视民航法规之事后，不但当事人浑然不觉，受处罚还大呼冤枉；旁人及看新闻的人大多也见怪不怪，为之辩护者不在少数。

3月21日的新闻就涉及两起有关航空安全的案例，一内一外，主角均为中国人。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国内航空器上：旅客解某与其同伴在宁波飞往昆明的航班上使用手机，被机组人员劝阻后，与之发生争执，随后谎称其同伴携带了炸弹。飞机抵达目的地后，该旅客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机场公安治安拘留15天。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国外航空器上：据环球网转引韩联社3月20日消息，一名中国乘客因座位问题与韩国乘客发生争执，并辱骂前来制止的乘务员，随后所发生的争执造成飞机延误2个多小时。仁川国际机场警方以涉嫌飞机内骚乱为由，给予该中国乘客不拘捕立案的处罚。

乘客在飞行过程中的机舱里能不能使用手机，各国规定不一，但中国是不允许的。既然有这样的明确规定，身为中国民航的乘客就应该无条件遵守，毕竟这样的规定在你同意搭乘中国民航班机时，就已成为相互之间的约定。这不光是个规则意识问题，也是现代公民理应具备的契约意识。

其实，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弱，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他们对航空安全的漠视，还每每表现在对随之而来的规制行为的抵触，压根不管那样的抵触是否会造成飞行安全之虞和航班延误，以及其他乘客之权益受损。

这方面的情况，同样表现在如何对待那起发生于韩国航空器的事件上。

那个中国乘客在大韩航空班机上的表现，实在是丢人现眼并有损国格。对于这一点，新闻跟帖者大多是认同的。遗憾的是，我所读到的多数留言，却一不批评该中国乘客占别人的座位无理且无礼，二不谴责其辱骂空乘并造成飞机延误2个多小时行为之恶劣，反倒是为其敢跟韩国人掐架、叫板而点赞，比如说“你在韩国旅游不对，丢中国人脸不对，和韩国人对掐扳回一分”，等等。

其实，对危及航空安全案件的处理，全世界的处罚都是相当严厉的。这是因为，飞行器不同于地面交通工具，一旦发生事故即很难控制其灾难后果的产生，所以针对飞机的安全保障措施会比针对其他交通工具者严格得多。

但一般民众并不一定明白，究竟哪些乘客行为会对飞行安全构成显性或潜在的威胁。比如，不少空难的发生，其实大多跟机上乘客的骚动密切相关，因为骚动会使飞机失去平衡，令事故发生。所以航空法规对那些在机上与乘客和空乘发生争执、造成骚动的行为，处罚相当严厉。旅客解某在宁波飞往昆明的航班上谎称其同伴携带了炸弹，这非常容易引发骚动；就算事后证明解某所言不实，但其行为已经对该航班的飞行安全造成了危害。那架韩国飞机上所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此。

何况类似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还不仅限于航空安全方面，也不光令航空公司的合法利益无端受损，还使其他乘客的合法权益同样因之受到损害甚至侵犯。

从野生动物园里事故的频发，到航空器中一系列漠视法规行为的不断出现，可见一些国人的规则意识、公德意识、契约意识等等，真的需要来一个大的提升。